

# 郑观应与晚清社会的三个派别

陈康衡

(南通市教学研究室 江苏南通 226001)

[摘要]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郑观应在其长期的商务生涯中,与晚清社会的洋务、维新、革命三派的代表人物都发生过重要联系。由此入手,考察郑观应与晚清主要社会阶层的关系,有助于对其思想进行重新认识和做出准确评价,以为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郑观应 晚清社会 派别 关系

## Zheng Guanying and Three Parties of Late Qing Dynasty Society

**Abstract:** Zheng Guanying was a famous thinker in modern China. As a businessman, he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ree parties of late Qing society: foreign business, politics innovation and revolution. From this aspect,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Zheng Guanying's soci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ajor social classes, this will help re-consider and comment on his thought in order to provide a mirror for the reform and open up policy nowadays.

**Keywords:** Zheng Guanying, late Qing society, parties, relationship

郑观应(1842—1921年),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原名郑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居易、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待鹤山人等。郑观应生长在一个商业色彩浓厚的士人家庭,17岁即进入上海商界,在商场中辗转奔波数十年,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诸多关键人物有过密切接触。

洋务、维新及革命三派的活动构成了晚清社会发展的主要线索,从目前掌握的有关史料来看,郑观应在其长期的商务生涯中,与三派的代表人物都发生过重要联系。由此入手,考察郑观应与晚清主要社会阶层的关系,有助于对其思想进行重新认识和做出准确评价,以为当前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

## 一、郑观应与洋务派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开端。李鸿章放手大干,创办了一系列军工和民用企业,郑观应与此事业发生了直接的关系。1881年郑观应受李鸿章札委出任上海电报分局总办;1882年郑离开英商斥资创办的太古轮船公司,被李鸿章委任为轮船招商局帮办,

其后转任该局总办;1891年,郑观应又被李鸿章委派为开平矿务局粤局总办。在合作过程中,郑观应精明强干的作风赢得了李鸿章的信任,称赞他“性情谨厚”、“志趣迥超庸俗”<sup>[1](p.529)</sup>、“笃实正派”、“熟悉利弊”<sup>[1](p.790)</sup>,言下颇有倚重之意。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坚人物,他在湖北兴办了一些轻、重工业和新式学校,继李鸿章之后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1893年,张之洞创设汉阳铁厂。1896年,盛宣怀接手铁厂事务,请李鸿章、张之洞札委郑观应为该厂总办。

郑观应之所以能与洋务派密切合作,除种种复杂社会关系的牵制促动外,最根本的一点即是其思想与洋务派官僚存在着诸多相通之处。不妨拿郑氏《盛世危言》同张之洞《劝学篇》作个比较。《劝学篇》具体提出了设学校、改学制、派游学、译西书、阅报刊、变法制、变科举、兴实业、修铁路、练新军等方方面面的设想,与《盛世危言》中的《学校》、《考试》、《游历》、《西学》、《日报》、《公举》、《开矿》、《纺织》、《商战》、《商务》、《修路》、《练兵》、《水师》、《火器》等篇正相对应。张之洞《劝学篇·变法》认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sup>[2](p.233)</sup> 郑观应

《盛世危言·道器》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sup>[31](p.56)</sup>又谓：“西人之所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sup>[31](p.57)</sup>不难看出，郑观应所谓“列圣相传之大道”与张之洞再三强调不可变的“伦纪”“圣道”“心术”同是一事，而张之洞所谓的“器械”“工艺”则可与郑观应文中的“格致诸门”相对应；至于“法制”，当是指国家的根本制度，与郑观应《盛世危言》中《议院》《公举》《原君》等篇所探讨的内容约略相近。

作为洋务派核心“中体西用”的思想，其实并非张之洞等人的发明。早在1861年，冯桂芬即已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西学富强之术”的主张<sup>[41](p.852)</sup>。但在张之洞以前，对这一主题表述最详备、最明快、社会反响也最大的文字，则当推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道器》和《西学》两篇。《西学》略谓：“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学。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sup>[31](p.76)</sup>1894年《盛世危言》刊出后，郑观应曾向一些当道官僚投献，张之洞即此或稍后曾读到这本书可能性是很大的。1896年到1897年，郑观应在湖北为汉阳铁厂效力，张之洞接触《盛世危言》至迟也当在此期间。张之洞1898年撰写的《劝学篇》，很难说没有郑观应某种程度的影响。

郑观应虽将《道器》篇列于《盛世危言》之首，祈望“由外而归中……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却并未忽略西学的重要地位。在《西学》篇中他指出：“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sup>[31](p.77)</sup>又批评洋务派的某些举措说：“至如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师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言语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法认真学习。”<sup>[31](p.77)</sup>细绎其意，实在提倡西学。这一点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郑观应说，考察了西方“风俗利病得失胜衰之由”以后，“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

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sup>[31](pp.50-51)</sup>。郑观应大段引用前两广总督张树声遗折中的文字，意在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即学习西方技术的同时，不能抛开西方思想文化，已具有体用一致的思想。但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社会一直处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势力统治下，改革面临巨大阻力。此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多种社会势力交错纠结，矛盾丛生，情势极为复杂。面对这一具体历史状况，意在振兴国势的部分有识者如郑观应等人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行事力求稳妥，在理论宣传上亦保持平实的低调。

据梁启超回忆：“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sup>[51](p.97)</sup>可见，“中体西用”在当时已经成了大多数有志变法者的共识。后期洋务派如张之洞等人，经过甲午惨败的刺激，逐渐走出洋务运动前期的误区，对于世界大势有了深切的了解，对于中国的改革事业也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形成干练稳健的处事作风，在具体事务上步步为营，平缓而有力地推动着晚清中国社会改革的进程。而“中体西用”论，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视作是他们调和激进派与保守派的矛盾，求得稳定发展机会的一种手段。正是在谋求稳健平和地发展进步这一点上，郑观应与张之洞等后期洋务派达成了一致。

## 二、郑观应与维新派

晚清中国的特殊社会状况使得1898年前后的维新运动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在晚年谈及戊戌维新运动时，曾将其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及父亲陈三立的作为与康有为等的行事加以区分，指出：“夫戊戌政变已大书深刻于旧朝晚季之史乘……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sup>[6](p.167)</sup>作为戊戌变法的知情者，陈先生的忆述可以帮助人们澄清历史事实，纠正许多对这一运动的简单理解和错误论断。维新派

实由两种人构成，一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激进分子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为“历练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由洋务派演进为维新派的稳健改革者如张之洞、陈宝箴等人，郑观应在商场中“历练世务”，会通中西之法，与张之洞、陈宝箴等殊途同归，亦当归于后一派中。

比较而言，郑观应与康、梁等在维新思想上颇多相通之处。“1896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说：‘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sup>[17](p.6)</sup>。其实，最早系统阐述“商战”问题的是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即有《商战》上、下两篇。郑强调：“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不攻兵阵，方且以聘盟为阴谋，借和约为兵刃。……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培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sup>[13](p.292)</sup>可知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所以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不独以兵为战，且以商为战。”<sup>[3](p.297)</sup>康有为“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其一家之哲学”<sup>[18](p.133)</sup>，缺少了郑观应“历练世务”的明通练达，他能够认清“灭国以商”的道理，恐与郑观应的影响不无关系。

建立议会制度是康、梁维新派的又一重要观点，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不久”，在“其所评学生文卷”上即“有开议会等说”<sup>[16](p.167)</sup>。到戊戌维新时期，此论经包括郑观应在内的众多维新者阐扬，早已广为传播。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篇中曾详尽论述创设议院、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设想，指出：“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故欲借公法以维大局，必先设议院以固民心。”<sup>[3](p.95)</sup>“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由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乃克臻此。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sup>[3](p.100)</sup>标志郑观应的思想已超越早期朴素的富国强民意识，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戊戌变法时期所颁布的一系列上谕，其宗旨多与《盛世危言》的议论相吻合，甚至可以说是在努力实现郑观应的社会改革理想。按理郑观应当

给予热情的肯定和支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有材料表明1895年底康有为到上海时，郑观应与之有过交往，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看出郑观应同以康氏为领袖的急进维新派之间确曾发生过密切联系，甚至一度还是同道。但后来康、梁变法时，郑观应却反应冷淡，内中缘故颇耐人寻味。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郑观应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当康南海召见时，有问弟政治能即变否，弟云：‘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譬如大指与尾指交，二、三、四指不扶助能举重否？’弟所谓大指者即宣统（当系光绪的误书——作者注），尾指即康南海，今不幸言中，亦势所必然非妄说也。”<sup>[11](p.1165)</sup>即此可见，郑观应在实践中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守旧诸臣仆，泄沓苟安不思变，变自鲁莽丛怨讟”<sup>[11](p.1319)</sup>的沉重现实作了充分的估计。他在此期的一首诗中阐述了自己的处事法则：“正气歌吟文信国，小心景慕武乡侯。棋非审定休轻下，策贵知几莫浪投。”<sup>[11](p.1297)</sup>强调要以审慎持重的态度来对待改革事业，严防急躁冒进，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郑观应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关系是稳健改革派与激进维新者关系的具体表现。“历练世务”的稳健派成熟老练，深谙中国国情，不事宣扬，埋头苦干，总是在条件适合的局部地区陆续取得一定的实绩，为全国范围内变法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康、梁等激进维新派出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热忱，往往不顾现实状况，一味求新求速，结果不但未能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而且连稳健派多年苦心经营而得的一点成绩也被抹杀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呼唤现代化的戊戌变法延缓了中国改革事业的进程，使中国错过了一次历史的机遇。

### 三、郑观应与革命派

在《盛世危言·农功》篇中，郑观应曾提起过这样一件事：“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试种莺粟，与印度所产之味无殊，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惟恐当道不能保护，反为之阻遏，是以踌躇未果。”<sup>[3](p.404)</sup>他所谓的“吾邑孙翠溪西医”就是同为广东香山人的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在郑观应的一生中，与之发生直接交往的革命派极为少见，因而他和孙中山的关系也就分外引人注目。现在已经无从知道郑观应同孙中山的交往究竟始于何时，他们之



间又有过一些什么联系。将孙中山与郑观应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是孙中山早年的上书事件。

1894年初,孙中山回到香山老家,闭门写成《上李傅相书》,而后一路北上,准备去见当时洋务派的首脑人物李鸿章上书进言。他在上海找到郑观应,郑观应写信给同李鸿章关系密切的官吏,请他们向李鸿章引荐孙中山。孙中山在上书中提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宏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sup>[9](p.27)</sup>有论者指出,孙中山“这次上书的总的精神是发展农业、工业,以使中国独立富强。他希望依靠清朝统治者的势力,从上而下地进行改革”<sup>[9](p.28)</sup>。可以说,此时孙中山的思想与郑观应是相似的,故而他的行动得到郑观应的大力协助。上书失败,孙中山大失所望,转而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那年年底,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就职,任程德全为内务部长,汤寿潜为交通部长,张謇为实业部长。这事实,正说明了立宪派(咨议局的代表),有着举足轻重之势”<sup>[10](p.562)</sup>。立宪派是由稳健改革派演变而来的,到20世纪初,其势力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当时各地立宪派已大体长成,以绅商为主体的地方势力日益坐大,并正积极议政、参政甚至主政,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sup>[11](p.151)</sup>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下去,有可能会出现郑观应所期盼的“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磐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sup>[3](p.52)</sup>的局面。但这种前景被辛亥革命彻底冲毁了。民国以来,即有研究者指出,清廷的覆亡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军派、官僚派,三种势力共同动作所致的……立宪派,其计较当前利害,与军阀官僚略同,但不如他们的固守,也不如革命派的激进,有时处于被动,也有时参加主动”<sup>[10](p.560)</sup>。立宪派卷入革命,是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临时应变之策,他们所希求的主要仍是以平稳之法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现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与时俱进,在民国的新形势下仍不断为旧日理想而尽力;而另一部分人则与现实格格不入,日渐消沉下去。郑观应正属于后一种人。

郑观应在广西镇压会党事件与粤路风潮中先后与革命党人发生过间接的冲突,对于革命派并无太多的好感。辛亥革命爆发时,郑观应正在四川

境内,他对这次革命的态度比对戊戌变法更加冷淡。其《西行日记》在引述了他人“武汉兵变,蜀省民变,皆由立宪不真,动施压力所致”的议论后,大发感慨说:“今烽烟四起,米珠薪桂,不死于水旱荒灾,而死于兵戈盗劫,有地方之责者,忍不奏报与仁人君子设法救护乎?”<sup>[12](p.1028)</sup>从语气中不难体会出郑观应对革命所带来的动乱扰攘局势的反感。此前清政府于1901年颁布“变通政治,力图自强”的上谕,又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一度沉寂的维新事业再度出现转机,郑观应根据新形势修订了《盛世危言》的部分内容,满怀信心地准备为宪政理想而尽力。但辛亥革命的突然到来改变了历史的方向,也打乱了郑观应的人生规划,1914年以后,他日益沉迷于道教的修炼活动,在精神上远离了令他深深失望的社会现实。

《盛世危言》付印之际,郑观应曾以“内患外忧,萦纆纆,天时人事感茫茫”<sup>[14](p.1288)</sup>之句表达自己的无限感慨,这两句诗既是郑观应忧国心绪的自然流露,也应反映了许多晚清爱国志士的情怀。郑观应是在晚清社会纷纭复杂的历史情势下成长起来的卓越维新思想家,其富国强民的襟怀、冲破陈规的胆识和求新务实的思想,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迪。

【收稿日期】2004年6月

【作者简介】陈康衡,男,1951年生,江苏省南通市教学研究室历史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和近代史、地方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公恸

参考文献:

- [1]《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 [2]转引自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 [3]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 [4]《中国哲学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 [6]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
- [7]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
- [8]王森然:《康有为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初集》,三联书店,1998年。
- [9]转引自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 [10]曹聚仁:《辛亥二谈》。《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1]李泽厚:《从辛亥革命谈起》。《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
- [12]《西行日记》。《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